

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需求转向与实践策略^{*}

徐秦法 刘星亮

[摘要] 提升乡村文化建设的质量,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新时代乡村地区绝对贫困问题得以解决,科学认识乡村文化建设需求的群体性、优先性和本土性转向,理性看待当前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导向不明、能力不强、动力不足”问题,加强乡村文化的思想道德建设和价值导向,构建多元治理,丰富治理手段,将宏观社会文化政策扶助转向微观层面的指引,提升乡村人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词] 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需求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863 (2021) 04-0065-05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直以来,乡村文化建设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战略部署之一,深受党和人民的重视。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与完成,使得农民的基本生活实现保障,文化已不再是以往可有可无的状态,文化需求在空间和层次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以新的时代定位和历史使命蕴含于乡村建设之中。另从协调发展角度看,乡村文化的发展与城市文化相比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广大农民的精神世界需要进一步去满足,乡村文化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顺应新时代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1]唯此才能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一、科学认识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需求转向

新时代广大农民的文化需求层次发生变化,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文化需求成为社会需要的重点,反映的是社会变迁与发展的一种走向和趋势。”^[2]如何让乡村社会逐步摆脱伴随者、跟随者的身份,发展成人人向往的新农村,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和构建,形成更直接、鲜明联结农民的文化活动,推动文化建设贴近农民的日常生活,建立在农民的需要之上。

(一)从宏观到微观:文化的群体性需求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之后,乡村文化、精神提升的方向性、目标性的明确成为可能性,文化需求的“个体化”和文化服务的“精准性”变为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文化建设取得显著效果,但受经济能力的局限,多是宏观的把握,而个体的多元化需求则需要进行确立。如果是大水漫灌式的文化服务,就会无法对接个体的精神诉求和满足,无法对其做到细致的管理和培育。一方面,要求对群体特征、能力、需求的精细化把握,对重点群体、特殊群体进行思想上的指引与帮扶。普遍的文化贫困现象直接体现为个体问题,解决乡村文化的不足,单从公众领域和视角下无法探寻真正的根源,还需要从个体中寻求解决路径,力求外界的公众视角与个体需要之间的互动与和解,这就要求必须进行差异性帮扶,进行合理的文化建设标准,不能进行量化和一味强制性引导。另一方面,文化建设和发展部署多数是面向地区而缺少单独个体或者群体的聚焦。长期以来,乡村文化建设多为从上而下的政策性引导,而缺乏互动,这就不能够将理论性的、政治性的政策性导向转换为形象的、生动的生活性导向。同时,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精神、思想上的改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不能求之过急,需要注重乡村的主观性、日常生活、个体性变化,不能以“落后、懒惰、愚昧”的抽象性的普遍概念,来代替或者想象乡村人民的心理机制。

^{*} 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编号:20JDSZKZ04)

作者:徐秦法,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星亮,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南宁 530004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从忽视到必需:文化的优先性需求

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乡村固有的封闭交往空间和生活方式,广大农民渴望参与到更大范围的社会生活中;渴望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得到尊重,梦想能够实现;渴望得到精彩与幸福,拥有欢乐,把控生活,做生活的主人,改变自身的生活环境。文化对农民群众而言,就由主观上的忽视变为必需,这也是从解放到生活,从生活为主体到我为主体的过程。精神世界的满足问题进入到人们的视野,成为思考的内容,人们重新意识到广大农村的文化土壤,乡村文化需要进一步推广和发扬。尤其是在乡村发展的历史交汇期,更要加强乡村人民精神上的引导。“我国乡村长久以来具有简洁治理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不同的形式对国家治理形成影响,并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辅助性力量,在当下的历史转型期能确保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未来发展道路更具稳健性和可持续性。”^[3]一方面,需要强化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意识,从领导层面、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进行完善,让文化建设措施丰富起来、活跃起来,加量、提质地丰富文化生活,催动乡村新的生活方式发展。另一方面,需要从乡村作为区域主体到日常生活的介入,弥补农民群众日常活动的单调性和生活情趣的缺失感,添加更多现代生活技能培训,拓宽了解外部世界的途径和平台。

(三)从自馁到自信:文化的本土性需求

“当代中国的乡村文化正承受着外来宗教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传统封建文化的多重挤压,乡村文化生态环境堪忧,有的地方出现了空心村、文化沙漠、乡村衰落和价值观塌陷等现象。”^[4]城镇化的发展逐步消解了乡村的传统精神秩序,乡村人民无法从其中获得生活的幸福感,生活变得无趣和缺乏活力,自身存在和现有生活方式受到质疑,尊严受到挑战,生活性文化受到冲击,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功能呈失效趋势。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动力和欲望鼓动起来,“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成为乡村人民的一种期盼,最终显现为对“资本”的追求。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既无法从城市中寻求温暖,又无法从以往发展缓慢的乡村文化中寻得慰藉和支撑,精神和思想上会产生顿挫感。农民群体无法正确定位自己,困惑于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实现自我价值与梦想。乡村面临的不再是贫困问题,而是对美好幸福生活的畅想,由物质保障转变为精神上的支持。对乡土文化的渴望与期盼,本质上是对自我身份的自信与尊重,精神上的喜悦与满足,对传统道德与人际关系的怀念与渴望。一方面,需要始终坚持发展第一的原则,让农村这块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持续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农民的自信,引导农民群体的身份认同和乡村情怀、文化认同回流。另一方面需要深入挖掘本地资源,对农民的日常生活进行整理和分析,改变不利的弱势困境,增强社会认同,增强广大农民对未来生活的期盼,提升农村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二、理性认识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问题与不足

当前,乡村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文化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机遇和要求。而现有的乡村文化建设机制存在理念陈旧、目标不明等现实问题,制约着乡村文化的发展。对乡村文化建设进行思考,从而坚持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确保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取得更大的进展。

(一)乡村文化建设“导向不明”

我国农村由于地缘、血缘关系等特点,以及特殊的伦理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等内生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其文化建设亦存在特殊性和复杂性。从乡村建设的内生实践出发和凸显个性化原则来看,部分地区乡村文化建设机制无法映衬出乡村文化的时代特色,乡村文化建设中存在“导向不明”问题。

一是部分基层组织领导意识不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要领导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的“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等重要论述均表明,“党是领导一切的”是乡村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党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怎样,将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与推进,直接影响乡村建设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性质以及现代化程度,直接决定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和保障。

随着乡村社会呈现出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等新特征,需要党发挥自身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在宏观上对文化建设进行指导,规范精神文化的目的性和功能,推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的核心价值,完善意识形态的体制,重视文化的价值导向,不断推进规范化和制度化,把握文化发展趋势,形成实践自觉。而部分基层党组织在文化建设中,容易出现功能定位不清、职权行使不到位、积极性不高、协调能力不强等问题。在推进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部分村民由于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淡薄,表现出参与冷漠、消极应对、拒不配合、损人利己等行为,甚至百般阻挠,一些宗族势力、家族势力,甚至干扰、肆意妄为,而部分地区基层党组织依法加强指导、预防、监管、整治的力度不够,需进一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确保乡村文化建设健康有序发展。

二是部分乡村地区文化建设主体意识不强。乡村文化建设只有依靠乡村人民,将文化置于生产和劳动之中,贴切乡村人民的内心渴望,才能焕发强大的精神力量。乡村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实现“人”的发展,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作为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助推器”。乡村地区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丰富的实践智慧,乡村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农民群众看待自身与周围环境的视角。而在时代快速发展阶段,广大农村旧的道德体系权威和信仰逐步失灵,新

的道德体系在乡村难以普遍性的产生与出现,人性的变化、人的发展与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等,出现肆意妄为的无序追求现象,这些困扰着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相对于城镇地区文化的安全问题相比较,乡村思想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禁锢、自固不动和愚昧、落后,缺乏对更高层次的精神信仰和追求,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整体理解和实践能力不足,行为处事多为欲望和感性主宰。脱贫攻坚的胜利,不等于真正解决了部分乡村人民存在的“等、靠、要”思想和“依靠福利、政策”的观念。

(二)乡村文化建设“能力不强”

乡村文化建设旨在回应乡村结构和治理需求的变化,解决文化建设动力不足问题,扩大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范围,需进一步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在场”,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良性互动,构成一个风险共担、联动共治、利益共享的“文化建设共同体”。需进一步加强乡村文化旅游体育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文化旅游体育人才下乡服务,重点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

一是地方党委政府由“管理者”转向“引领者”力度不够。新时代的乡村文化建设要面向人民需求、社会发展规律、国家发展目标。推动乡村文化建设,需要党委政府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内涵,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升村民精神风貌,保障和实现村民文化权益,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而当前,乡村文化需求的多样化发展将会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无法长期有效的满足乡村民众的文化权益。在文化建设上,基层党委和政府未完全实现建设主体向建设主导的转变,由“管理者”转向循循善诱的“引领者”,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乡村党委把权力定位为把准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而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不够坚实;乡村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市场监管、法治保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进一步体现,转变以政府为权威的自上而下、指令式控制的传统模式,为各类文化组织和农村群众发挥文化潜能增加动力,鼓励不同主体发挥各自强项,真正实现优势互补、协商合作、分享权力、共同决策,提高文化建设的社会化、民主化、协同化水平。

二是部分社会组织由“参与者”转向“共同决策者”的力度不够。村民自治、村务监督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组织以及各种经济社会服务组织已成为嵌入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变量,亦成为助推乡村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可以推动互益性、公益性文化组织蓬勃发展,丰富日常文化活动,满足农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文化需要。部分基层党委和政府未重视社会组织的管理和力量,对如何引导其由乡村文化的“参与者”转向“共同决策者”的认知不清,如何充分释放创造能量,群策群力,保障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加充足

需要进一步构建完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具有鲜明特色和社会影响力,反映农民生产生活、乡村振兴等“三农”题材的优秀文艺创作各地也层出不穷、精彩纷呈,各级各类文艺惠民演出深入农村,农村科普工作不断加强,农民科学文化素养不断提升。如何通过各类社会组织,熔铸和传播乡村民众乐于接受的道德精神、价值理念和社会认同,在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需要的同时,有效破解乡村文化既存的困局,满足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需要进一步思考。

(三)乡村文化建设“动力不足”

第一,行政手段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支撑不够全面。从政策层面,基层政府推出的文化优惠政策,理应促进乡村文化企业的发展,激发创造动力。但部分基层政府惯用简单粗暴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存在行政过度介入的弊端,没有明确行政作用边界,有着阻碍更高质量发展精神、观念等。认真听取群众反映的机制不健全,未能全面深入调查了解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完善文化政策,因地、因人,制定具体政策措施,无法确保乡村文化建设各项决策落到实处。因此,需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宣传好政策和标准,统一思想认识,需要思考用更文明、高水平的精神面貌参与到新的发展目标之中,打破小安即乐的思想,持之以恒弘扬公序良俗、培育文明乡风。

第二,法律手段融入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度不够。乡村文化建设,既要明智也要明理。善于运用新媒体、新技术,采用乡村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开展普法活动,广泛宣传法律法规,增强其法律意识,做到懂法守法,引导村民文化享用的同时要遵守法律法规。“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5]坚持以真善美为边界和标准,分辨什么是“幸福生活、美好生活”,打架斗殴、赌博、铺张浪费、摆面子不是美好生活。一方面,需要进一步用法治规范文化建设。乡村以往的评价体系缺乏理性,道德感强,法制思维轻,从而德与法之间相互制约、互相推动的秩序被打破。乡村地区的文化类型较少,乡村人民自身的法治意识意愿不足,急需运用法制知识与先进文化相结合,形成脍炙人口的歌曲、民谣等,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是简单意义的满足和享乐。现有的陋习、旧习需要进行调整和修改,各种邪教、宗族、黑恶势力依旧存在,需要进行有力打击,推动乡村移风易俗。例如,2019年兰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兰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等多个部门,帮扶皋兰县什川镇上泥湾村的文化建设,在村里开展文化教育和传播工作,推动乡村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浙江景宁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推动畲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等多部法规,规范引导乡村文化建设,遵循“什么不足建设什么,什么不好改进什么”的原则,推动乡

村文化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以文化引领法制建设。多地区未能实现将优秀民俗融入到村规等制度和章程建设之中,形成普遍性的共同认识。村民的精神世界更新较慢,要开发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统节日,充实精神世界,实现新旧精神的立与破。乡村地区专业性学习平台不足,需要组织专家到乡村地区进行具体文化建设指导,与村民面对面交流,通过提高村民的创造能力来提升法律素养,通过“点对点、面对面”交流,特别是老弱病残、生活困难的群体,走进其精神世界,通过文化消除贫困的后遗症。

三、合理构建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机制

乡村文化建设是一个综合系统工作,涉及到诸多方面,承担着协调乡村社会关系、规范乡村社会行为、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稳定乡村社会秩序以及实现乡村幸福的时代使命。乡村文化建设需要思考,传承、保护什么,去除什么。既要考虑到传统文化层面,又要从现代文化层面思考和准确定位,既要结合乡村人民的发展实际,又要紧跟时代和国家发展战略设计。“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矛盾、农业主要矛盾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农民群众有更高的期待,需要对农业农村发展提出更高要求。”^[6]这势必倒逼优化乡村文化建设,需要从单一的行政手段转向多种实践手段并存的综合发展之路,满足乡村文化建设的需求转向。

(一) 思想道德层面

“文化脱贫”的前提是加强农村道德文明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党委、政府、村民自治组织三级联动,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宣传与教育,逐步提升村民思想道德水平。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在涵养核心价值观、传承乡风、敦化民风、倡导乡村公益、培养文明风尚等方面的价值引领作用,加强乡村文化理论研究和传播,“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赋予中华农耕文化明新的时代内涵。”^[7]创新乡村文化活动形式,挖掘乡村文化的理论精髓、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引导村民传承传统美德,树立家国情怀,自觉把爱家与爱国统一起来,增强振兴乡村的践行能力。积极发挥宗祠文化,利用先祖高尚的精神、感人的事迹教育和感化族众,规范村民的日常行为方式,调节农村社会生活和心理,统一思想和行为,凝聚人心,稳定农村社会生活秩序。及时关注农村社会问题,对农村地区出现的热点和难点事件,及时对群众进行疏导和解读,消除困惑,避免形成恐慌,努力形成健康向上、团结和平的农村社会心态。

(二) 科学技术层面

“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推动农民整体媒介素养的提高,拓展农民的文字阅读能力与影音阅读能力,提升整个乡村的媒介认知力,是充分发挥媒介对乡村

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内生动力生成的关键所在。”^[8]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创新治理手段,提高科学技术在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贡献率。乡村文化的建设不应只是花瓶式地摆放,表面上热闹,要真正能够起到感染人、鼓动人的作用,为乡村人民输送动力和方法,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实践能力。打造“互联网+”乡村建设新模式,推动智慧文化下沉到乡村,加强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统筹整合多样化数字服务资源。科技手段推动的“数字治村”不仅提高文化建设的效率,“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降低乡村文化建设成本,同时实现流动村民“共同在场”,切实维护每一位村民参与家乡文化建设。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合力满足乡村地区儿童的发展需要。利用互联网、先进技术进行乡村红色文化的保护和建设,丰富乡村人民的生活方式,激活家庭生活氛围,用知识竞赛、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进行先进文明家庭评比。例如陕西省延安市制作了许多弘扬社会良好风尚、传递真善美的短视频等,通过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送到乡村地区,影响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以同村人作为榜样,进行模范家庭树立,开展“向榜样学习”活动。文化建设的成就不仅体现在文化物质形态的更新上,更体现在农民精神素质和力量的增强之上。特别要注意到新时代的传播媒介快速发展,影响着乡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要学会运用微媒体和自媒体等先进技术,进一步加强建设效果,满足乡村文化的受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诉求。

(三) 价值观念层面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重点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9]乡村建设的核心是价值观的确立,乡村文化的价值导向需明确包含着对正确行为观念的发展与鼓励,能够直接影响人们的观念和和行为选择。要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未来的发展预期相吻合,如“幸福、合作、进步”。还要遵循乡村人民的发展逻辑,譬如对生活目标、个体发展目标、乡村建设目标、尊严感、自由感、权利保障等详实内容。又要符合传统的道德要求,如诚实守信、兄友弟恭、以和为贵等。对于乡村文化的设计来说,任务繁重,时间紧迫,但是又不能强制性改变。长期的价值观设计要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乡村文化的功能设计,改变现有乡村文化建设的无目的、临时、片面现象,对于一些封建陋习要废除掉,譬如封建迷信、重男轻女、狭隘自私等思想,从而引导乡村文化积极、有序发展,让乡村“富起来,强起来,美起来”。短期的价值导向设计应注重日常生活层面的直接引导,如乡村人际关系的改变与维护,做到独立、团结、友善等;人与社会关系的要求,如和谐、公正、文明等;人与自然的关系,如环保、低碳、节约,合理开发与利用等精神品质。

(四) 村民主体层面

“农民主体是指农民在日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特别是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农民群众在处理对象化关系和对象化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主体能力。”^[10]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必须以农民为主体,坚持选贤任能的原则,推动人才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发现人才、凝聚人才、培育人才,充分发挥贤能在乡村文化建设、服务、管理等方面的核心作用,以解决乡村文化建设能力不强的问题。“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还跟不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比较突出。”^[11]普通村民构成了乡村人口的大多数,但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留守农村的多为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尽管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他们多用回避、沉默、拖延、拒绝配合等消极手段维护和争取权益,但他们却是对乡村基本情况最了解,乡村情怀最深的群体。这就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如全面建成农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村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实现数字广播电视、互联网户户通,确保村民共享优质数字文化资源。实现乡村健身设施全覆盖,提升村民健身意识,增强身体素质。例如,河北邯郸市推行“欢乐乡村”的文化活动,以贴切近农民群众的生活内容为主题,设计了丰富的活动形式,包括歌唱比赛、乐器比赛、舞蹈比赛、小品、摄影作品展览、书画剪纸等,广泛动员和鼓励普通村民以“划桨人”的身份“出场”,通过开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群众性节日民俗活动等,繁荣发展农村文化市场,丰富精神生活,激发人心向上、向善、向美,增强民众的归属感,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动力。

准确把握农民群众的思想动态,通过文化的载体来增强农民群众的信心,坚持自力更生、弘扬勤劳致富的观念。让农民群众重拾对乡村、土地的感情,激发农民群众的发展志气,增强农民群众的发展底气,为发展鼓起勇气。通过文化建设激发农民群众生活的信心和

勇气,用身边人、身边事带动广大农民群众通过奋斗来获取幸福,激发其内生动力。例如,浙江景宁大力培养乡村文化人才,通过健全文化人才引进和管理制度,注重本地的特色文化使者培育,通过组织文化工作人员进行能力培训和成立工作室等方法,壮大乡村文化建设的力量,实现乡村文化依靠人民建设,由人民共享。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产品创造,展现文化建设的人民情怀,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就要求广大理论和文艺工作者要努力为农民群众提供更高水平、接地气、贴现实的文化供给,让农民群众能够从精神产品之中受到启迪和熏陶,提高自身的素养。同时深入农民群众,形成农民群众熟悉的、喜欢的表达方式,说出农民群众的心声,传递社会正能量,激发农民群众精神力量的内生动力,把农民作为精神产品的最终评判者、文化的享有者。①

[参考文献]

- [1][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3.
 - [2] 陆益龙.乡村文化的再发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4).
 - [3] 韩鹏云.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
 - [4] 黄一斓.乡贤文化影像建构的世纪转型[J].江苏社会科学,2019(6).
 - [5][6][9][11] 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J].求是,2019(11).
 - [8] 张春艳.新媒体语境下的乡村文化建设[J].长白学刊,2020(4).
 - [10] 陈学兵.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重构[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 (责任编辑 王跃然)

The Demand Turn and Practical Strategy of Rural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Xu Qinfa Liu Xingliang

[Abstract] Striv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the due meaning and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realiz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ince the new era, the problem of absolut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has been solved. It is necessary to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 the group, priority and local turn of the need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We should rationally look at the problems of “unclear orientation, weak ability and lack of motivation” in the current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rural culture, strive to build pluralistic governance, and enrich governance means, turn the macro social and cultural policies into the guidance of the micro level, enhance the values and mental outlook of the rural people,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Keywords] new era, rural culture construction, demand and practice

[Authors] Xu Qinfa is Dean and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Liu Xingliang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